

周恩来逝世前,为何专门叮嘱修改这个人的《辞海》条目



1975年年底,周恩来总理饱受病魔摧残,生命之火日渐微弱之际,他嘱托秘书去办了一件事:在《辞海》上,给一个人的条目加上:“他最后加入了共产党”。

由此,一个湮没了近半个世纪的秘密得以揭开。

这个人,名叫杨度。此前,他一直被绑在拥立袁世凯称帝的历史耻辱柱上。

杨度的中共党员身份之揭晓,源于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的一篇文章《难忘的记忆》,作者是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他撰文怀念周恩来总理,其中有这么一段: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同一年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文章《关于杨度入党问题》:“杨度确是党员,确是同志。”同样在这三版,还刊登了夏衍的文章《杨度同志二三事》。

《辞海》修订了杨度词条:

杨度(1874—1931),近代湖南湘潭人。字哲子。王貽运门生,留学日本。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与杨笃生等创刊《游学译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议院参政,次年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组成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袁世凯死后被通缉。后倾向革命,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

捕前后,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加入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反复无常”与“苦苦求索”

常人看来,杨度之“奇”,在于他的“反复”。

但研究者认为,杨度并不是一个“反复无常”之人,偏偏,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研究者张晶萍指出,杨度并非一个反复无常、道德品质败坏的小人,他的一些抉择之所以让人侧目,往往只是由于他作为书生的固执而已。

今人不能超越特殊的历史阶段去评价一位置身当年历史之中的人,袁世凯对杨度有知遇之恩,杨度对他寄予厚望。唐浩明在小说《旷代逸才杨度》中说到,即使是秉承“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杨度也甘愿为袁世凯驱驰,更何况袁世凯让他看到了“君宪救国”希望:衰老腐朽的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可望平稳地走上民主富强的现代化之路。只是,他的选择,已逆时代大势,一时身败名裂,在所难免。

事实上,当时对袁世凯寄予厚望的人,不在少数。学者谢本书所著《蔡锷大传》中,就写了蔡锷也曾经是袁世凯的坚定拥护者,他在从云南赴京任职时曾对部下表示:“现在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戌那年因为他临时告密,我们的师徒,有的死、有的逃,现在想起来,犹有余痛。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删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蔡锷甚至表示:“袁是中国的一个人才,能把中国治理好。”袁世凯称帝后,蔡锷才打消了对他的幻想,辗转回到云南,举起义旗。

蔡锷在变,杨度其实也在变。一个如此聪慧而又自负的人,在巨大的失败面前,不可能不反思。唐浩明在《旷代逸才杨度》中,写了袁世凯死后,杨度去湖南浏阳拜谒谭嗣同墓地,看到谭嗣同身后所受的尊崇,想到自己孜孜以求却背负一身骂名,不由失意至极,痛定思痛。夏衍也写道:“至少在他晚年,我认为他倒是很善于自我剖析的。他对我说过:‘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时,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改变了想法。’”

1917年6月,张勋率5000“辫子兵”进入北京,拥戴已退位的清末代皇帝溥仪复辟。这场闹剧只持续了12天。清廷

曾一度邀请杨度入京参加,但出乎意料的是,杨度坚决拒绝,并通电痛斥张勋和掺和其间的康有为:“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与其说他“反复无常”,不如说他在“苦苦求索”。研究杨度,不可忽略的是:他始终是一个爱国者,因为爱国,而苦苦寻找救国之路。要知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句名言,版权所有者是杨度。

杨度之女杨云慧总结得很好:“一个爱国主义者所走过的道路,并不都是那么简单的,有的甚至非常曲折。但是,只要他真心爱国,即使像我父亲那样顽固的君主立宪派,最后还是捐弃了成见,投身到无产阶级阵营中来了。”

“要想救中国,我看只有共产党能做到”

杨度思想的更大变化,发生在李大钊牺牲后。

李大钊对杨度影响很大,让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7年,李大钊被捕。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四处活动,竭力周旋。陶菊隐的《六君子传》中,详细写了这一过程。李大钊牺牲后,杨度悲痛不已,为他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所感动。他以能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为幸事,卖掉北京家里的值钱首饰,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将所得金钱全部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留下了“毁家纾难”的佳话,也激发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迎来了人生最重大的改变。

杨云慧回忆说:“有一次谈到国家大事时,父亲颇有感触地说:‘要想救中国,我看只有共产党能做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也是第一次听到父亲说这样的话。”杨度入党的1929年,正值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夏衍回忆说,有人因为杨度入党而嘲讽他投机,“他曾对我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学者谢春涛把杨度入党的历史,收录进了《字——40个人的信仰选择》一书。读他们入党经历,会想到一个词:“殊途同归”。他们各自出身不同,教育不同,经历不同,在国家民族发岌可危的黑暗年代里,在各种思潮、各种主义、各种党派纷繁复杂的背景下,他们曾经挣扎、彷徨、困惑,他们苦苦寻找,上下求索,甚至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 □关山远

■人物春秋

1275年前的长安

代在西安这片土地建都,在历史上先后被称作丰京、镐京、栢阳、咸阳、汉长安、大兴、长安、西安,尤以秦汉隋唐四朝都城闻名,而最负盛名的便是唐代历经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长安城。长安是唐代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城市,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往中心,而唐代也是长安最为繁华和辉煌的时期。开元年间,京兆府有363909户,城内人口达一百万人,城外郊区又有近百万人,总共近两百万人口,相当于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唐代长安兴建于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唐代沿用了隋朝的宫殿和都城,据考古发掘,长安东西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城墙厚9到12米,城墙外还有宽9米、深4米的护城河,全城面积约84平方千米。外城共有十二城门,四边城墙各三座门,城内的坊有说是108个,有说109个,还有说是110个,分别是方形或长方形。

西市和东市是长安城内两处集中的贸易市场,每市各占两个坊的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大小。东市称“都会”,西市称“利人”,两市各有二十二行,为长安城内士、农、工、商提供各种商品,西市的大衣行、綈行、秤行、裘家蜡烛店、侯景先当铺等都很有名。此外,两市还有大量外地商贩和外国商人来此贸易。西市因靠近西门,方便由西域来的商人,多是来自印度(天竺)和波斯(大食)的商人,比东市更繁荣。据考古研究,市场内店铺酒肆鳞次栉比,宽约4到10米。

长安城的主干道朱雀大街是一条南北通衢大道,南端正对着正南门明德门,北面正对着皇城的朱雀门,这条被百姓称作“天街”的街道宽度达到150米。《长安十二时辰》中写此街“路面中央微微拱起,两侧有深沟,路面覆着一层厚厚的浐河沙……这是天子御道,老百姓只能沿指定的九个路口横穿,不能越线,也不许快跑”。古建筑专家张驭襄在《中国城池史》中描述,市民住在坊间的合院建筑中,一般穷苦大众都在坊内的弯曲小巷“坊曲”中。大街上没有商店,两旁都是官署衙门寺院等,道路两旁种植的树木以槐树为主,整齐

茂盛,诗人岑参曾以“青槐夹驰道”描写此景。

除却宫城、皇城和东西两市外,长安住着京城所有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三教九流、各国使节,有的热闹有的幽静,有的显贵的有市井,各有特色。虽然各坊面积大小不一,但规划相当有规律,也遵循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在《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一书中薛凤旋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长安与稍后的欧洲中世纪城市相比,是一个更加自由开放的城市,各民族、文化、宗教和商品在此受到包容和礼待,但尽管如此,长安的里坊制度仍旧表明了它是严格的等级社会。长安工整的等级观念,比汉魏和南北朝时更为严格,是成熟的儒家城市结构的典型。

大人物的宅邸

在《长安十二时辰》中一重要角色便是赫赫有名的大诗人贺知章(剧中改称何监)。贺知章在天宝三载时已八十多岁,向玄宗告老还乡,因其是太子李亨的老师,太子在朝堂上处境不妙,李林甫与王永李麟等多方攻讦,太子地位岌岌可危,便请老师掌管靖安司,以便在朝争中斡旋,抵挡明枪暗箭。

右相李林甫的宅邸与贺知章的宅邸坐落的位置便可看出二人身处状态。长安城因北边是宫城禁苑,故北边繁华南边萧条,不少达官贵人都会选择与皇宫住得近些。李林甫的宅邸不但邻近皇城,更靠近青楼密布的平康坊,暗示了李相沉溺声色的内心。

另一边贺知章的宅邸在离权力中心稍远的宣平坊中,静谧却风景大好。书中这样介绍这片闹市桃源:“宣平坊这里地势很高,坡度缓缓抬升,远远望去就像是在城中凭空隆起一片平头山丘。这片山丘叫乐游原,可以俯瞰整个城区。乐游原和曲江池并称‘山水’,是长安人不必出城即能享受到的远景。原上的乐坊、戏场、酒肆遍地皆是,又有慈恩寺、青龙寺、崇真观等大庙,附近靖恭坊内还有一个马球场,是长安城为数不多可以公开观看的地方,是城中最佳的玩乐去处之一……贺知章住的宣平坊,正在乐游原东北

■钩沉

又是一年立秋时。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秋的画面,印染着金色的霞光。“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梧桐,便是秋的使者,她的叶儿牵着秋的手,仿佛融了音乐的旋律、和声、节奏,笑吟吟地舞在天地间。

梧叶报秋来

秋天的到来,是伴着梧桐,有着特别的仪式感的。

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宋代。立秋这天,皇宫内的人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移入殿内,等到“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便以雄浑悠长的嗓音,抑扬顿挫地奏道:“秋来了。”语毕,梧桐竟应声落下一三片叶子。秋,就这样到了。

古人非常看重梧桐,在他们眼中,梧桐是有灵性的草木,树中佼佼者,能知时知令。《通甲书》说:“梧桐可知日月正闰。生十二叶,一边有六叶,从下数一叶为一月,至上十二叶,有闰十三叶,小余者。视之,则知闰何月也。”“梧桐不生,则九州异也。”

古人还很早就把梧桐与同样有灵性的鸟中高贵的凤凰联在一起,《诗经》的“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就展示了这样绚丽的画面:作为雄鸟的凤与作为雌鸟的凰相和而鸣唱,圆润和谐的歌声飘飞山岗,梧桐则身披灿烂朝阳,蓬勃生长着。凤凰“自歌自舞,其声若箫”(《山海经》语),梧桐仿佛弹奏的琴瑟,与凤凰相随。此情此景,不正是“琴箫中和”吗?

而梧桐真是可以做琴瑟的,华夏民族人文先始伏羲发明的琴、瑟,就是以梧桐为主材。《古史考》说:“伏羲作琴、瑟。”记载了从上古传说至明末历史的纲目体通史《纲鉴易知录》也说:“伏羲制桐为琴,缁丝为弦;缁桑为瑟。”当时,伏羲看到祥瑞之鸟凤凰“非梧桐不栖”,认为梧桐也是神灵之木,用来做歌颂天地的琴是最好不过了。伏羲便叫人把梧桐砍来,选择三丈三尺高的,截成三段,以“三”象象征天、地、人。他还用手指敲弹梧桐木料,听音选材。他认为音太清或太浊,木质便会过轻或过重,清浊相济的才轻重相宜,适宜为琴。

伏羲真是有心而讲究的,这样的人才能听到梧桐里深藏的奇妙之声吧。东汉文学家、音乐家蔡邕也感知过梧桐之声。那时他经过吴会之地(今湖北一带),看到一个老农在烧柴做饭,突然觉得被烧之“柴”发出的声音异常入耳,便认定是一块斫琴的良材梧桐,忙把这段木材从火中抽出来,一看果然是梧桐。不久请人做成琴,把烧焦的一段做成琴尾,取了个艺术范的名字:焦尾琴。

桐叶无戏言

梧桐不仅引得凤凰来,还常常引得人们跟和与流连。

作为桐的一种,它与青桐、白桐、冈桐一起,被历代医药学家详尽描述,南朝宋齐梁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说:“桐树有四种:青桐、叶、皮青,似梧而无子;梧桐,皮白,叶似青桐而有子,子肥可食;白桐,一名椅桐,人家多植之,与冈桐无异,但有花、子,二月开花,黄紫色……冈桐无子。”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也说“盖白桐即泡桐也”“其花紫色者名冈桐”“青桐即梧桐之无实者”,李时珍无疑格外重视梧桐,在《本草纲目》木部中,他列

了“桐”之后,又单列了“梧桐”。

梧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用处颇多,它的树皮可用于制作绳索和纸张,种子和果实可以食用或榨油。

最有趣的,是它的树叶,那阔大的、一般长和宽均为10至22厘米、呈三角状卵形或椭圆形的树叶,是立秋时节小孩儿爱拾捡玩耍的,西周初期幼年继位的周成王(周武王的长子诵)还把梧桐叶玩成了典故。

那一年立秋,恰逢梧叶飘落,周成王随意拾起一片梧桐叶,剪成圭状,对弟弟叔虞(周武王次子)说:“以这个封你到唐地为侯。”圭,古时写作珪,是古代帝王典礼时手执的一种上圆下方的长形玉制礼器,象征高贵,表示信符,用于区分爵位等级。很快,辅佐国事的周公旦奏请周成王择吉日册立叔虞。周成王听后不以为然,说:我们在做游戏,我只是和叔虞开玩笑呢。周公旦则严肃地说:天子没有戏言,说出来的话都会被史官记载下来,然后行之于礼,见之于乐,一言九鼎。周成王便接受了周公旦的意见,把唐地封给了叔虞。叔虞即载入史册的“唐叔虞”、晋国的开国始祖。

这是《吕氏春秋》和《史记》都记载了的“剪桐封弟”,“君无戏言”也诞生在这个故事中,剪桐也开创了剪刻艺术的先河。剪桐这一手法和战国时期出现在皮革、银箔等物品上的镂空刻花一样,都与纸张产生后的剪纸同出一辙,也是剪纸的起源。

音乐家们更是不忘梧桐,用梧桐琴伴着“剪桐封弟”轻轻传唱。桐叶无戏言,像一个个坚定的音符,立在乐章中,宛转成浓淡相宜、高低相配的和声。飘落的梧桐叶,也从始于报秋,继而天下知秋,引申为“见叶落而知岁之将暮”,以小明大。

梧桐兼细雨

按中国古典哲学核心五行“木、火、土、金、水”来分类归纳,在四季“春、夏、长夏、秋、冬”中,秋对应金,在五种情志“怒、喜、思、悲、恐”中,秋对应悲,在五声“呼、笑、歌、哭、呻”中,秋对应哭,因此,秋天、秋风虽然被称为“金秋”“金风”,清平和而悦,但也常令人“悲秋”而泪流。泪和雨也常常如影随形,君不见那“泪如雨下”呀。梧桐又是桐的一种,桐被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列为“下品”,下品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可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下品多引悲”。梧桐、细雨、伤悲仿佛不清自来。

写梧桐比较多的算是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李清照了,她的《行香子·七夕》“草际鸣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念奴娇·春恨》“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等,无一不是愁、愁、愁。若不是后半生经历了国破家亡和颠沛流离,李清照不会这么愁。

梧桐和细雨,也早已是经典的文学意象,唐代诗人温庭筠的《更漏子·玉炉香》“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北宋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撼庭秋·别来音信千里》“碧纱秋月,梧桐夜雨,几回无寐。”都令人黯然神伤。

当冷雨敲打着阔大的梧桐叶,一点点,一滴滴,仿佛与心上的忧伤,汇流成河。选择梧桐兼细雨作为忧愁的衬托,是文人在以特别的形式表达对梧桐的爱,只有高贵的梧桐,才配得上心灵深处的忧愁。 □管弦

府兵制便名存实亡了。

府兵制建立于西魏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一直到唐代由唐太宗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重新划分全国为10道、630余府。这“府”也就是折冲府,入军府的男子平时农耕,守卫京师,根据任务出征戍边,这些士兵就是府兵,是当时唐朝的兵力主要组成部分。士兵的部分武器装备比如战马、武器、马镫、被褥、炊具、粮草等都要自备,而盔甲、长矛、弓箭等则是由官府统一配发。因此当兵每户家庭还要承担大量开销,因此在初期普通的农户甚至中农也无法支持这样的开销。而在当时能为国家当兵还是一种荣耀,大多参军的都是世家大户或者家境殷实的富裕子弟。平时的耕种交给佃户而不用担心收入来源,只管放心练兵,这种又有社会地位又能实现抱负的模式,在唐初为大唐提供了非常强大的战斗力,塑造了府兵制的巅峰。

府兵制鼎盛与所处的时代环境关联非常大,而它的衰败也是一样。府兵制比较依靠兵源自身的经济条件,而随着唐朝的发展,均田制被破坏;土地兼并日益增多,大量户口流失导致府兵制征不上兵员。而边镇驻防所需的兵力越来越多,内地又征不上来兵,让他们轮替的时间越来越长,士兵们越发感到自己这样做的意义何在,思想上产生极大的厌恶。而原来守卫京师的任务也被各种专门募集的禁卫军所代替,府兵的荣誉感下降社会地位降低,甚至沦为权贵的私人奴仆。随着军府设置数目越来越多,唐明自开元以来边境压力激增,频繁用兵,使得量上去了质下来了,精兵不断被稀释。

为了弥补兵源,唐朝在坊间招募各种健儿作为临时兵源,这些人有些是临时的有些是长期的。由各个军区按照固定名额招募,吸收了大量的农民,减少了内地城市治安压力。而募兵制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健儿的出现和发展更加快了府兵制度的瓦解,最终在开元二十五年,由李林甫主导玄宗允许各军区自己募兵。实行募兵制以后,唐朝军队总体数量减少,但核心战斗力提升,天宝年间唐朝边境形势由颓势转为主动。曾经为国家付出代价的府兵,在旧制度濒临崩溃的边缘,似乎一夕之间就被历史扔进了垃圾桶里。 □徐亚军

■往事